

万卷方法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解释性 交往行动主义

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

■ 诺曼·K·邓金 著 ■ 周勇 译

第2版

重庆大学出版社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解释性

交往行动主义

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

重庆大学出版社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2nd edition by Norman K. Denzi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Copyright © 2001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3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第2版,作者 诺曼·K·邓金。原书英文版由 Sage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Sage 出版公司。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Sage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渝核字(2003)第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美)(Denzin, N. K.)著;
周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7

万卷方法

ISBN 7-5624-3185-X

I. 解... II. ①邓... ②周... III. 人际交往—研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051 号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

诺曼 K 邓金 著

周勇 译

责任编辑 雷少波 版式设计 周晓

责任校对 蓝安梅 责任印制 张立全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张鸽盛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字数 190千 插页 2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 5624 3185 X/C 75 定价 1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译者简介

诺曼·K·邓金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传播学、社会学及人文学科领域的资深研究员，已出版过许多专著，包括《解读种族：好莱坞与种族暴力电影》、《解释性民族志：21世纪的民族志实践》、《电影社会：偷窥的目光——后现代社会的形象》、《研究行动：社会学方法论导论》、《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好莱坞——一枪接着一枪》、《康复的酗酒者》、《酗酒者的自我》。由于在符号交往行动领域的学术贡献，邓金1988年获得查尔斯·库利奖，1997年获得乔治·赫尔伯特·米德奖。他曾担任《社会学季刊》、《文化研究》（月刊）的编辑，合作主编过《*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本书中文版将于2005年初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和《质性探究》，此外，他还主编过“符号交往行动研究系列丛书”。

周 勇

生于1973年2月，1996年至200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师从丁钢教授。2002年9月起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研究领域为教育、文化与社会，曾在《教育研究》、《读书》、《经济学消息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近30篇。

为方法理性鼓与呼^{*}

——万卷方法策划报告暨出版说明

究竟是中国内地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漠视,导致研究方法出版物的匮乏?

还是研究方法出版物的匮乏,导致学界没有对方法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

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作为图书出版的编辑人和策划人,对之多论无益。

但,作为图书出版的编辑人和策划人,我们却非常乐意——为方法理性鼓与呼!

我们乐于,也更善于从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的比较中,来了解和表述某一类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情况,以此作为我们图书出版策划的基础。同样,在万卷方法的策划之前,我们便对美国、中国台湾及中国内地三者,1999—2002年间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图书出版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美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出版物的数量之多,至少足以让我们惊讶!由于不便统计,在此,仅就美国的 SAGE 出版公司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图书出版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以窥其一斑。SAGE 出版公司 4 年中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书籍(包括再版书)便有两百余种,其中,既有一两百万字的大部头工具书,如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 Measurement*; 也有 10 万字左右的口袋书,如仅一个“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系列丛书”(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便有 49 个品种,其中每本书对于案例研究方法、调查研究

^{*}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 年 3 月 31 日,第 15 版。在此,根据需要作者对原文做了少量改动。

方法、网络调查方法等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其覆盖面之广,研究之深入、具体、操作性强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如果说,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尚可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同一时期,中国台湾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也足以令我们汗颜。4年间中国台湾出版了大量深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书,其中不但有本土作者的原创作品,也有从英美等西方国家引进版权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作品。更为可贵的是,其中有几家出版公司已经注意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着眼来组织自己的策划和出版,在这方面的出版有了一定的规模,内容的组织也显得比较成熟:如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的“研究方法系列丛书”、弘智文化事业公司的“应用性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系列丛书”等都是发展比较成熟、规模比较大的专门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列丛书。

而中国内地方面,同期虽然也出版了一批研究方法的书,但无论是规模还是研究内容的深入丰富程度都无法与美国及中国台湾两地相提并论。从规模看,这期间中国内地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类的著作也就四五十本,难望美国同行之项背,仅与中国台湾同期出版规模大致相当。从此类出版物内容的深入丰富程度来看,大陆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类出版物主要集中在各学科内部,如教育研究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等,每本书都面面俱到谈调查、谈案例、谈访谈、谈田野、谈观察等,而很少有对某一种方法进行深度研究的图书,更没有像美国或中国台湾那样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列丛书。在这一领域,这样的图书结构对于应付大

学本科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入门性需求（即作为教材）还行，但对于迅速培养一大批拥有科学、理性的研究头脑的学者，特别是对于青年学者，如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成长则是远远不够的。其致命的弱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本书铺得太开而无法细化深入，以至于绝大多数学生虽然上了方法的课，却除了记住了几个名词和对一些方法的理论及应用略知一二之外，至于什么情况下选择什么方法最恰当、具体怎么操作、这种方法可能会有哪方面的不足需要加以处理等研究细节问题仍然处于无理性状态。其二，既然我们的方法建设囿于学科内部，而不能对方法进行纵深的开发，那么，反正学科就那么几个，于是方法书大多是低水平重复。比如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现在全国使用做教材的至少也有十多本吧，但你若有心思看的话，一本足矣！其三，出版界对研究方法图书这种淡淡的一笔带过的做法，不仅很难形成一种风气，从意识深处提升起大家对于研究方法的关注，而且更加剧了整个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漠视，许多学者只有在著书立说之时才想到似乎从“作品结构的完整性”上看应该谈及方法问题。

社会科学界近年流行两个词语：一曰反思，二曰接轨。所谓反思也即是对于学科的理论基础、学科的结构、学科的历史与未来等问题的全面梳理；所谓接轨也即是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融入世界社科研究的大潮中，与国际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实现彻底的、清晰的对话。在此，我们以为，无论是反思还是接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和传播界都必须投入一些精力来关注、研究、教授和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惟如此，才能在中国形成完善、科学的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体系和学科群，也才能使对研究方法关注与理性应用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深入人心、蔚然成风；惟如此，也才能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搭建一个平台。

以上种种，促使我们策划出版了万卷方法系列丛书，献给忠实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

雷少波 崔祝

2004年6月于重庆大学出版社

十字路口的社会学写作

——译者前言

近些年来，从历史、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等角度对现代知识进行质疑的力度日益加深，许多人均不由自主地像福柯等人那样对现代知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厌恶与否定。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觉得，人文社会学者自身的社会位置与处境也逐渐由以启蒙大众自居于世的“立法者”变成了只能偏安一隅对自我进行启蒙的“解释者”，而一旦想去谋求更多的听众，就要么是空想，要么担心即使能这样做，也会被人认为是在追求“权势”。

在这种形势下，为什么从事社会学写作？社会学写作能够（或应该）表达什么样的“故事”？便成了由于各种原因落入社会学领域的作者们必须予以深思的基本问题。总之，质疑现代知识并在质疑之后寻找合适的写作理由与主题（所谓“合适”是指能让人“心安理得”，甚至献出自己一生的探索热情），这一点可以作为理解邓金这部著作的精神前提。

从理论上讲，光是去质疑现代知识，而且不必像福柯那样，将对现代知识的批判隐藏在漫长繁重的历史探索之中，人文社会学者便可以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安排妥当，也就是一辈子只写批判现代知识的理论性著作。有些人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甚至因此成了以解构现代人文社会知识（或文本）著称于世的“后现代哲学家”。

这似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不仅可以“宣泄”长期以来在“现代性的生存结构”中苦苦挣扎的压抑心情，而且能够“避免”承受那些“玩世不恭地或是真诚地转向右派”（伊格尔顿语）的人们所承受的公共舆论压力，始终以“精神界战士”的形象保全自

己。然而,这样做却无法省略另一种顾虑,这就是可能会让人觉得没有创作出真正具有建设意义的作品,为人们提供另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邓金的选择非常清楚,他不仅要去批判现代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现实主义探索生产现代知识体系当中没有的知识。他说:“我们想去搜寻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体会他们的成功,理解他们曾经有过的创伤、恐惧、焦虑、梦想与希望。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平凡却意义丰富的故事。无疑,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解释计划,而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也很清楚,这就是描述那些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人们是如何度过各自的人生历程的,并将这些历程‘表演’出来”。我们之所以给邓金的著作加这样一个标题——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正是为了点出邓金的求知兴趣。

由于是写一本侧重于方法论的专著,邓金并没有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一些普通个体的生活经历及其意义,而只是在论述的过程中,不时点缀一些人的经历片段,其中有挨打的妻子、酗酒者等等——尽是些在公共领域没有发言资格的普通大众。邓金对这些人有过专门的研究(Denzin, 1987a、1987b、1987c),在他看来,任何旨在帮助他们的社会计划都必须以对他们的真正理解为基础,而许多社会计划之所以会失效,就是因为没有做好一点。

借助于“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邓金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理解方式,一种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常规解释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尽力让生活世界中的“沉默者”(这些人要么不在社会科学中

“出现”，要么出现了也是扮演一个“沉默”的“任人宰割”的无名者）自己开口说话，说出自己对于自身处境的理解。至于如何进行这种社会学写作实验，邓金在这本专著以“深度描述”的方式对每一个步骤做了详细介绍，虽然这样介绍方法，会让读者觉得过于罗嗦了一点。

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邓金在这部著作中更是对当前的一些批判话语做了归纳，他似乎想在读者心中掀起新一轮的“讨伐”热情。但是，就国内的阅读走势而言，真正能够刺激人们感情的内容或许是他对格尔兹等人的批判，因为格尔兹这些人在国内许多读者当中正被树立为新的知识偶像。然而，邓金的批评却恰恰要给国内这些读者（包括译者在内）泼一盆冷水，从而提醒我们去思考，格尔兹等人究竟在解释什么，他们是如何做解释的，以他的方式真能将“巴厘岛人的故事”及其“意义”叙述出来吗？

邓金认为，即便是善意对待当地人的格尔兹也是在“自言自语”，也没有在自己的解释人类学作品中给当地人提供足够的表达空间。的确，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读者或许觉得邓金的论述伤害了自己的感情，因为他居然毫不客气地说：格尔兹的解释“都是格尔兹本人对于斗鸡的理解，巴厘岛人并没有把这些意义带入自己的斗鸡游戏中”。“格尔兹的解释也因此远离了巴厘岛人斗鸡的真实体验”，是“格尔兹将自己的解释强加在当地人的经验上”，“这是一种独白性的解释”。

从邓金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日常生活世界不是由帕

森斯式的社会学概念构成的，也不是由解释人类学家的诗意想象与感受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一个的普通个人的活动、言语、思想、情感构成的，是一副复杂的交往画卷，社会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如实地描绘这副画卷。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邓金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列举文学、诗歌、艺术、新闻、电影等等领域的叙事方式，因为这些“表演性”的叙事手段最能揭示“那些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人们是如何度过各自的人生历程的”。

从邓金的叙事目标出发，人们很自然地还会怀疑起韦伯、福柯等人的现代性研究，甚至觉得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揭示现代社会的生活真相，而只是以学术话语叙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体会。可是我们这些人早已习惯了顺着韦伯、福柯等人的体会来理解现代社会，这怎么办？也许今后为了进行社会学研究，人们必须“抛弃”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学知识”，这似乎恰恰就是邓金所要完成的胡塞尔意义上的意识还原或概念悬置。

但是，另一个问题随之也会产生，真的抛弃了“社会学”，必然会“惹怒”，乃至必须被迫离开社会学体制，接着又会被社会学体制相关的社会体制驱逐，成为一名自由的现实主义“作家”或出没于地下的“歌手”，他们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故事，用来写作或歌唱。那么，社会学家有勇气面对这一可能“失宠”的命运吗？邓金估计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说：“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因其学术理念违背了社会科学领域诸多科学主义研究传统的意愿，只有那些钟情于质性的解释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才可能会使用本书中所讨论的方法与策略”。

有意思的是，在极力“背叛”传统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解释性的研究者并不一定会落得个无所依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所起用的那些新方法有可能将他引入另一个文化群体当中去，研究者甚至会主动加入另一个文化群体，这个群体正是所谓的由作家、记者、导演等等组成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邓金没有直接表明对这一群体认同立场，但是细心的读者都可以从他的方法论偏好中揣摩出这一点迹象来，这就是关怀普通大众命运的解释性研究者在文学、媒体以及影视界比在社会学界更能实现自己的叙事抱负。

最后说一下，译者最初知道邓金，是因为读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的著作《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在该书的参考文献中（第493页）列有4本邓金的专著，但是这本著作没有列上去。而译者之所以答应翻译此书，除了深受重庆大学出版社编辑雷少波先生的热情鼓舞之外，还因为第一次打开邓金的这本书时，看见里面频繁出现叙事、故事等等词语，亲切感油然而生；恰巧我的导师丁钢教授也在国内教育学界提倡“叙事转向”，致力于揭示普通教师或学生的生活感受（参见《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5辑），故而决定翻译此书。

丁钢教授常对我说，叙事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天赋”。对此，邓金似乎亦是持赞同态度。在他的这本著作里，时常流露出对一些文学大师（包括福克纳、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钦佩，钦佩他们对于普通人物的生活经验的“深度描述”能力，尤其是福克纳，邓金更是反复挂在心头。这让我想起了国内一位同样非常钦佩福克纳的作家余华。他曾谈起自己的阅读体验，说“那是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而他自己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何尝不是能给读者带去类似的体验。

事实上，就国内早期的社会学而言，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以及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叙事风格上都能给人一种亲切感。也许这里的关键仍在于社会学写作究竟要去表达什么，是把握并规划某一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还是倾听并理解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带来轻松的学术生活。

周 勇

2004年3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英文版前言

1989年,当本书第1版公开发行时,关于质性研究方法这一主题,可以找到大量的社会科学文献,但在“解释性”的方法方面却看不到任何深入的讨论,也没有提出什么存在主义的观点(参见Douglas & Johnson,1977;Kotarba & Fontana,1984)。至于运用解释性的方法来研究个人问题,或者通过这种方法转向考察交往个体的生活,同样也看不到什么严肃认真的尝试。本书的推出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状况。^①在这部著作中,我结合自身及其他人的探索实践,向人文学科的学生和学者以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方式描述了批判性的并且带有存在主义味道的解释性方法。^②

新版延续着初版的主题。1989年以来,质性研究领域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解释性的交往行动主义在这次(方法论)爆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事实上,它可以归属于一场更大的由改革主义者发起的理论运动,该运动至少在二十多年前即1970年代就已开始。正如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乃是各种复杂的认识论及道德主义的批评一样,解释性的批判性范式及其多元表现构成了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Schwandt,2000,P.189),它们拥有自己的

① 同年,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解释性的传记》(*Interpretive Biography*)的相关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从传记、生活故事出发,深入探讨了解释性方法的意义。将近过了10年,我又推出了《解释性的民族志》(*Interpretive Ethnography*),以求深化早年出版的这些著作,其中特别关注我们书写文化的多重方式。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两卷本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的理论框架(Denzin & Lincoln,1994,2000a)。

② 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或方法,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已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兴趣与关注(对此,可以参见Carspecken,1996;Charmaz,2000;Coffet,1999;Creswell,1998;Flick,1998;Hollway & Jefferson,2000;Schwandt,1994)。

学术期刊、研究协会、各种学术会议,并在大学里获得了教职(Denzin & Lincoln, 2000c, P.x)。目前,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已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包括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工作、广告学、市场学以及消费者研究。

20世纪90年代,质性探究领域掀起的强劲变迁势头在新的世纪里仍在持续。今天,几乎没有人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叙事转向。相反,许多人都在各自领域里讲述故事。此外,写作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单纯、呆板的活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写作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社会学与人类学不断地尝试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有的甚至写起了小说、戏剧、表演文本和民族志诗歌(Ethnographic poetry)。社会科学杂志也因此在举办各种小说创作竞赛。市民社会的新闻记者也在试验不同形式的民族志写作方式。

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呼声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持续回荡,声势越来越大。有的学者称此为探究的“第七时刻”(“The Seventh Moment” of Inquiry, Denzin & Lincoln, 2000b, P.2, 12)。^①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时刻,其意思是指人们纷纷从传统中突围出来,致力于倾听以往只能归于沉默的声音,转向各种表演文本,同时关注各种道德话语,强调在民主、种族、性别、阶层、国家、自由以及社区等等层面展开批判性的对话(Denzin & Lincoln, 2000, P.1 048)。

在这个第七时刻,在21世纪伊始之际,从事批判性的解释性的

① 在过去的著作中,林肯和我曾对“第七时刻”做过界定,依次包括:传统时期(1900—1950)、现代主义时期(1950—1970)、类型模糊时期(1970—1986)、再现危机时期(1986—1990)、后现代或实验主义时期(1990—1995)、后现代实验时期(1995—2000)以及未来(2000—),参见 Denzin & Lincoln (2000b, P.2)。

质性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成这个世界朝积极的方向转变,是作为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者的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言外之意,我们需要将各种批判质性研究的新颖方式置于自由民主事业的中心位置来加以审视。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 1959)中,米尔斯向人文学者发出了挑战,呼吁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论上的常规态度,以便有能力考察经验世界中出现的各种私人困境与公共话题以及公共领域对这些困境的反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此外,还可参见Agger, 2000, P.265; Lemert, 1997b, P.161)。很明显,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在本质上乃是历史的、传记性和交往性的。

米尔斯非常清楚,人类生活在“二手”的世界中,存在决不仅仅是由交往作用或社会行动决定的,对此,米尔斯曾强有力地论述道:“既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也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在人的意识与其物质性存在之间,耸立着的乃是各种交往、图景、范式以及价值。正是这些东西对人类所拥有的意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Mills, 1963, P.375)。人类无法直接进入现实。事实上,现实正是由各种位于人以及所谓“世界”之间的符号再现形式包括叙事文本、影视剧本等等间接表现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将世界直接抓在手中,我们只能认识世界的各种再现。我们分析人们对自己或对别人表达自身经验的方式。经验表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诸如仪式、神话、故事、表演、电影、歌声、论文或自传。同样,经验也有多重表现,包括问题性的、日常性的、仪式性的、局限性的以及心灵发现和转折性的经验等等。

米尔斯希望他的社会学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他鼓